

武汉敦本堂救生局始末

□ 姚育胜

2000年初,笔者在书肆觅得《千里江城——20世纪初长江流域景观图集》。这本书的原作,是山根俤三于1916年出版的《长江大观》。山根俤三在中国生活20年,游历长江一带,用相机记录长江10年。他从自己拍摄的1000余幅照片中,选辑优秀者150张,定名《长江大观》,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用珂罗版印制、出版发行。

《长江大观》记录100多年前长江的山川、城市和人文风貌,是一本史料价值高、充满艺术性的长江摄影集。

在《长江大观》中,有一幅武汉晴川阁的照片。照片左侧,一栋粉墙青瓦的房子,墙上写有“敦本堂救生局”六字。紧靠“敦本堂救生局”的长江岸边,有几艘船舷头部有“名号”的木船。凭职业经验,笔者判断“敦本堂救生局”是一个水上救生机构。当时,本想一探究竟,却一无所获。20年来,笔者留意此事,寻根溯源,终有收获。

寻迹敦本堂

清代汉口盐商范锺在道光年间所著的《汉口丛谈》中记载:“胡晓岚,一字东海老人,江都人,侨居汉口。平居敦笃善行,老而弥坚,江汉相距一水,往来帆樯如织,每遇暴风,往往有沉溺之患,虽有官设救生船只,江面辽阔,不能遍及。老人心焉悯之,于施救事宜,筹之已久。会太守沈公亦以此劝募地方,老人闻之曰:‘是可以成吾志矣’,因命其子元谋之同志之士,创议于晴川阁设局置船,救生会所。自癸未迄今,仅三载,赖以救活者甚众,此善之大者。”

我寻觅多年的敦本堂救生局终于开始有了眉目。原来,敦本堂救生局始建于清道光三年。创建者是原籍江苏扬州江都、侨居汉口经营淮盐的著名商人胡晓岚,具体实施者是胡晓岚的儿子胡元,以及侨居汉口的淮

盐商人姚必远。姚必远原籍安徽皖江(在今安徽潜山市),父兄在汉口相继经营淮盐。姚必远为人尚义气、重承诺,“遇公私事之纠纷者,入手即迎刃而解。排难解纷,人依赖之”。

胡晓岚、胡元和姚必远三人是敦本堂救生局初创时期的核心人物。当然,三人中,胡晓岚居首。

2016年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汉学家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的《汉口——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(1796—1895)》汉译本。在这本书中,我惊异地发现,作者对敦本堂救生局了解甚多,记述甚详。而且,罗威廉的记述和200年前范锺的记述竟然十分契合。至此,武汉敦本堂救生局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。

敦本堂救生局就设在汉阳城外的晴川阁,附近有善堂码头,最初时只有4条船。2015年3月,笔者看到一篇报道《小船高挂“救生”旗》,文中附有一张照片。照片摄于1900年前后,是一张清代汉阳敦本堂码头牌楼的老照片。

照片的中心是写有“敦本堂码头”字样的牌楼。牌楼的两边各写二字,分别是“积厚”和“流光”,这应该是敦本堂救生局的宗旨。牌楼四柱脚立于水中,牌楼下停泊大船小船共五艘,桅杆上高挂着写有“敦本堂救生”字样的旗幡。船上有竹篙晾晒的衣物,说明船上的人员24小时生活在船上,遇有紧急情况可随时驾船出发救援。这是见证“敦本堂救生局”的珍贵照片,真实地记录了敦本堂救生船泊岸待发的生动场景。

敦本堂在开办之初的几年中就获得很大成功。到1839年,增加了5条船,并在武昌城外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,开展救捞工作。后来,敦本堂救生局还在武昌金口和护国寺设立分局。

晴川阁畔的守护

据光绪年间编撰的《汉阳县志》记载,在敦本堂救生局建立的最初17年间,共营救了4132名落水者,打捞尸体6955具。

敦本堂救生局不仅救人捞尸,还做好善后工作,做到善始善终。敦本堂向幸存者提供医药和容身之处,对财产丧失殆尽、家乡路途遥远、无力回家者,酌情发给路费。对江中捞起的尸体,敦本堂出资安葬,使其入土为安。

在创立敦本堂两年后,胡元、姚必远及其盐商同仁们开始建立汉阳县的第二个善堂——同善堂。同善堂也位于汉阳城外。同善堂在龟山上有一块免费墓地,专门安葬无法确定身份的死者 and 无力安葬的死者。

敦本堂救生局设在汉阳,但出资人大部分在汉口,而且主要是盐商。在清代的海关文书上,有时又称“汉口敦本堂”。不过,武汉人不必在这事上争“名分”。1899年前,汉口只是汉阳县下属的一个镇,叫汉口敦本堂,还是叫汉阳敦本堂,都没错。

自敦本堂救生局开设救生红船后,



清代汉阳敦本堂码头。

汉口敦实堂救生局也设置了救生红船。至同治八年,武汉地区同时有敦本堂救生局、敦实堂救生局、培心堂、培元堂、衡善堂、益善堂、永安堂等民间善堂的救生船,在长江、汉江分段游弋,从事水上救生活动。

百年救溺路



晴川阁下“敦本堂碑记”石碑乃珍贵的白松石,现已被钢化玻璃保护起来。

铜钱,为敦本堂救生局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财源,用大义和仁爱,传递中华传统美德,谱写武汉城市精神。

跨越时代的接力

全监督。辖区内有航行船舶65000余艘,船公司近2000家。该局沿江设立了100多个巡航救助执法大队,日日夜夜、年年月月,长江海事人驾船守护船舶和船员安全。

同时,武汉“民间”的水上救助也不可忽视。2010年5月18日,武汉水上救援队成立。2015年6月28日,在武汉水上救援队的基础上,成立了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,并在武汉市民政局注册。到2018年,其遍布武汉市江河水域的基层

队伍有38支,队员1871人。从总队长到普通队员,都是志愿者,参加救助没有收入。从2010年至2023年底,已挽救900余人的生命。10多年来,广大队员发扬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,恪守“行善立德”的志愿理念,长年累月值守江边河边,挽救生命,用善行义举诠释人间大爱。

敦本堂救生局的精神生命不息,长江水上救生的传统不灭,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传承不变,将永续百年千年。

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



清朝时期的汉阳晴川阁。 来源于《长江大观》

从受阻到立制

清朝时期,已建立起较为庞大的水上救生机构。清乾隆十五年,全国共有268个水上救生机构,其中67个在湖北省。在武汉地区,最早的水上救生机构于17世纪末建立,之后曾有过短暂停顿,1747年又重建。按规定,它配有10只救生船。

但到19世纪,武汉的水上救生机构已难以胜任使命。据了解,全国其他地方的水上救生机构一般是“官设民办”,而武汉地区的水上救生机构必须有官府的保护,以阻挡那些衙役的掠夺。就这样,筹办中的武汉“民营”水上救生机构夭折了。

清道光三年,胡晓岚决定自己实现救生船计划。他亲自到汉阳知府处禀告,得到知府的支持。知府同意由胡元具体办理建立水上救生机构的工作。于是,胡元、姚必远以及其他几位商人开始在盐商同仁中集资,

以设局置船,兴办救生会所。

当年年末,官府批准了“敦本堂救生局”制定的章程。此后,“敦本堂救生局”先后得到汉阳府及湖北省的正式批准设立。章程明确规定,“敦本堂救生局”独立经营自己的救生船,不与已有的官办救生机构发生关系,也尽可能避免与后者的“业务”重叠。与此同时,“敦本堂救生局”的“首事”得到正式授权,可以拒绝任何衙门职役提出的非法捐款要求,或以其他方式妨碍救生船运营的要求。

六年后,湖广总督周天爵在给善堂撰写的碑铭中,又重新申述了上述原则:“善堂以助人救人为务,故管理之责甚重。若以其贵委诸衙役无赖之徒,终必貽害无穷。惟士绅愿受委亲承其事,督其贵,方可济事。若此,则善举非必出于官。此举合乎大义,本督甚德之。”

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。敦本堂救生局建局之初,就建章立制。敦本堂救生局章程规定,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救活一个人,就赏给救生船船夫1500钱;捞回一具尸体,赏300钱。

当天气恶劣时,赏金增加,因为此时救生船夫所冒风险更大。章程规定,当天气较好时,在得到敦本堂救生局“首事”的明确同意后,救生船船夫也可以做其他事,比如摆渡客人和货物过江。章程还规定,对不属于敦本堂救生局的船夫,若愿意驾船打捞遇难者,同样支付赏金。章程也明确规定了对雇员不法行为的严厉惩罚。